



情报机  
巧  
与克里姆林宫

〔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 著

魏小明 陆柏春等 译

東方出版社

# 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

(俄) 帕维尔·苏多普拉夫 著

魏小明 陆柏春等 译

東方出版社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серии

Виталий Чернявский

Обложка: дизайн—Д. Захаров

Верстка—А. Панов

© Текст. Оформление. Разработка

серии. ТОО"Гея". 1996.

© П. А. Судоплатов, 1994.

我社已获俄罗斯著作权协会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中文简体字本出版发行本书。未经许可一律不许以其他形式出版或摘录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魏小明 陆柏春 游凯军

常兆裔 余永寿 李 伟 译

徐锦栋 王世福对本书部分章节进行了校订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1580

## 出版说明

本书系俄罗斯盖亚女神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往事揭秘丛书”之一。作者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是前苏联情报机关的退休中将,在国家安全机关从事情报工作达 32 年之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不仅亲自参与制定计划,而且亲自负责执行计划。1953 年 8 月,受贝利亚事件牵连,他被前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在牢狱中度过了 15 年囚徒生活,直到 1992 年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书叙述了前苏联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甚至触目惊心的事实。例如,计划刺杀托洛茨基;前苏联情报机关与当代著名科学家玻尔、费密、奥本海默、爱因斯坦密切合作,窃取美国和英国的核情报,从而加速前苏联原子弹爆炸的进程;前苏联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招募为克格勃间谍,插手东欧事务;利用间谍活动和二战期间形成的犹太人组织,图谋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国家等等。由于作者是克格勃高级军官,亲历、亲闻、亲见了这些事情,因此,对许多历史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对重大事件的叙述真切详尽,为我们研究前苏联历史和了解克格勃内幕提供了极具史实价值的资料。

为了尽量地保持本书的原貌,我们仅对少量明显有失公允的议论做了必要的删节处理。必须指出的是,书中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褒贬扬抑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本人爱憎的感情色彩,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正确对待。

## 作 者 的 话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 1930—1950 年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惟一见证人。

尽管经受过战前和战后年代的迫害,尽管被监禁过 15 年,但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奇妙偶合,我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写出了一些反映那个时代各种事件错综复杂和悲剧式发展的历史回忆录。

间谍和反间谍事业向来没有得到俄罗斯领导人的应有重视。但是,在前苏联时期,间谍和反间谍事业有时在当局行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作为一名职业谍报工作人员,我并没有什么名望。但是我觉得,在前苏联解体以后,首先是由于那些无原则的争吵和国内争夺权力的斗争,使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人们讲述发生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事情的真相,使他们懂得我们祖国历史中的那些悲惨的和英雄主义的事件的发展逻辑。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的回忆录只不过是一个目睹者的讲述,讲述使前苏联的政治机器运转的那些机构是如何工作的,讲述这个左右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世界许多事件发

展进程的强大国家是以何等巨大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不仅使本国公民也使整个世界畏惧的超级大国的。这个国家的力量在于消灭贫困和崩溃,深信 20 世纪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正因为如此,前苏联得到了当代世界的一些大科学家——玻尔<sup>①</sup>、费密<sup>②</sup>、奥本海默<sup>③</sup>、爱因斯坦和其他人的同情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前苏联和西方世界的剧烈对抗是我国内外政策的所有事件中相互不容异见的主要原因。

今天,无论人们如何争论,我始终笃信不疑的是,西方国家执政的人物不仅仇视我们国家,而且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企图扼杀这个国家。在战争年代,美、英、苏三国为了对付希特勒主义,不得不结成联盟,但它们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因此而停息过。冷战在继续,只不过西方从维持世界霸主的利益考虑,不希望前苏联在同德国的斗争中迅速失败。一直到 1991 年 12 月以前,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削弱前苏联。今天,由于转入同西方国家对抗与合作的新阶段,我们正在经受痛苦的折磨。西方国家依然把俄罗斯视为当代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和以往的年代不同,今天人们关注的不是我们的国家能否生存下去。前苏联的遗产是我们取得转折的可靠保证,它使我们成为国际舞台上和谈判中的强大对手。当然,国内不稳定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不可避免地会使目前的执政人物经常把错误的责任推到过去的领

---

① 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创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译者注

② 费密(1901—1945),意大利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和中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译者注

③ 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曾领导美国原子弹制造工作。——译者注

导人身上。那些对当代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作出贡献(这种贡献至今依然是祖国的骄傲和无可辩驳的事实)的人之所以有时遭到非议,甚至仇恨,其原因也在这里。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事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遗憾的是,我除了首先在西方出版我的回忆录之外别无他途。我衷心感谢 Дж·舍赫捷尔和 Л·舍赫捷尔,是他们对我的回忆进行了记录和润色,并帮助它们问世。

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对这本书的完成给予了很大帮助,他们和我一起分担了这项复杂和危险的工作的所有困难。我还要特别感谢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道义上帮助的前苏联对外侦察局局长 Л.В·舍巴尔申、С.А·阿纳宁、П.И·马休、А.Н·雷洛夫、И.А·邵尔斯、Ю.А·科列斯尼科夫、З.В·扎鲁宾、А.Х·卡马耶夫-菲洛年科、作家兼政论家 К.А·斯托利亚罗夫。

帕·苏多普拉托夫

# 目 录

- (1) 第一章 战斗的洗礼
- (29) 第二章 西班牙事件
- (51) 第三章 镇压的年代
- (65) 第四章 刺杀托洛茨基
- (91) 第五章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
- (136) 第六章 战争年代的情报机关
- (198) 第七章 原子谍报活动
- (254) 第八章 “冷战”
- (307) 第九章 劳尔·瓦伦贝格 “X—实验室”
- (329) 第十章 “克里米亚的加利福尼亚”
- (358) 第十一章 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
- (400) 第十二章 贝利亚垮台和我被捕
- (449) 第十三章 法院,监狱,为恢复名誉而斗争



## 第一章

# 战斗的洗礼

我 1907 年出生于乌克兰的梅利托波尔市，这里盛产水果，当时约有居民 2 万人。我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乌克兰人，他是个干杂活的，烤过面包，开过面包铺，干过厨师，当过听差。像我们家所有孩子（我们家共有 5 个孩子）一样，我在俄罗斯东正教堂里受洗礼的那天是彼得保罗日。我在小学学的是《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以及俄语的基础知识，因为在沙皇时代学校里是不允许教授乌克兰语的。乌克兰语只是作为口语被使用。10 岁之前，父亲还在世时，我过着极为平淡的童年生活。他死后，一家人的生计就全由母亲和姐姐操持了。父亲死的那年闹起了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起初，城里的生活变化不大，一切照旧。然而，粮食快吃完的时候乱子就来了，土匪也闹起来了。我们家没有任何财产，我们住的一座平房里的两居室房间是从房主赫罗连科那里租来的。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认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也没什么可失去的。读了布哈林所写的《革命 ABC》之后，我自然而然地笃信：财产归全社会所有将意味着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将由体现普通百姓利益而不是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代表来管理。

我哥哥尼古拉在 1918 年参加了红军，两年后他成了契卡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在这之前一年，年仅 12 岁的我从家里跑出来

参加了红军团。不久,该团就被迫撤离了梅利托波尔。我们团被白匪军所击溃,只有一小部分战士得以与红军第四十四步兵师一个分队在基辅地区会合。因为当时我已念完小学,书也会读了,所以就被派到了通信连。稍后,我参加了基辅战役。1921年我年满14岁时,师特工处人员遭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伏击,许多人阵亡牺牲。那时,我们主要不是和白卫军作战,而是与彼得留拉以及“赛切弓弩军”军长科诺瓦列茨率领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军队打仗。国内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并于1919年1月正式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宣战。(30年代和40年代中,我也曾直接参加过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到了1992年1月,当乌克兰流亡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承认克拉夫丘克为乌克兰主权国家合法总统之后才告结束。

损失惨重的特工处急需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于是我便被派往安全机关工作。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

我所在的那个师里,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不但有波兰人、奥地利人、德国人、塞尔维亚人,甚至还有中国人。他们纪律严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非常残酷,有时,整个村庄都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匪帮们赶尽杀绝:在内战期间,乌克兰共有100多万人死亡。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对这次战争的残酷性习以为常,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景象也司空见惯了。我们以为那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国家从1914年就处于战乱之中,俄罗斯的悲剧则在于:直到1922年内战完全结束时,还不能建立一个基于正常人道价值的稳定社会。

担任话务员和译电员使我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发往指挥部的文件由我盖上“秘密”的印章,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费利克

斯·捷尔任斯基从莫斯科直接发给我们的电报也由我解译。

1921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们师被调到日托米尔。我们特工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的契卡组织打入彼得留拉和科诺瓦列茨所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游击队内部。这些武装匪徒从事着反对地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活动。契卡的两名领导波塔热维奇和萨温与游击队头目建立了对话渠道,并与他们进行了非正式谈判。我的领导同他们是在日托米尔的秘密接头地点会晤的。我作为一名下级工作人员,就应该住在接头地点的屋子里,并为谈判提供服务。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武装头目在当地实际上是主人,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对我日后在国家安全机关从事业务工作具有很大帮助。我亲身体验到应该如何对付地下的阴谋活动。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进行了近两年的时间,以妥协告终——他们的头目接受了苏维埃乌克兰政府的大赦。这只是发生在科诺瓦列茨派往日托米尔的两千骑兵被红军部队包围并缴械投降之后。科诺瓦列茨匪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场战斗中,我在波兰边境上当边防军的哥哥尼古拉牺牲了。我打了报告,想调往梅利托波尔,以便离家近一些,也好接济家里。

在梅利托波尔的3年中,我担任了军区国家政治保安局某处的初级工作人员,负责活动在希腊、保加利亚和德意志居民中的情报员的工作。1927年,我受到提拔并被调往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科夫,开始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正是在哈尔科夫,我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艾玛·卡冈诺娃,我当时20岁,她比我大两岁——她是从白俄罗斯城市戈麦尔来到乌克兰的。

艾玛很有才华,她曾就读于一所对犹太人有限制条件的中学。她念了几年书,后来在布尔什维克戈麦尔省党组织书记哈

塔耶维奇那里当了打字员。当她的上级调往敖德萨担任党组织领导工作时，她也随之调动。正是在敖德萨，艾玛转到了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被指派分管该市的德国侨民工作。因为她长得金发碧眼，又能讲一口与德语非常接近的现代犹太语，外表也特别像德国人。

在我到哈尔科夫工作的前一年，她已被调到那里。艾玛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里的地位，比起当时我这个新手要重要一些。她很有教养，天生丽质，加上她博览群书，在作家与诗人的圈子里显得非常自如，所以就被委派到乌克兰创作知识界（即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中领导情报员工作。我们是在工作中相识的，她的美貌和聪颖使我折服。艾玛的父亲是个放排工人，他死的时候艾玛只有 10 岁。她开始工作，并独自担负起全家的生计，她们家共有 8 个孩子。因此，我和艾玛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我和她都是家庭的顶梁柱，都是由于家境所迫而过早成熟了。

尽管我们的生活排满了工作，妻子还是督促我参加了哈尔科夫大学的法律研习班。但说实话，我只去听了 10 次课，只有经济地理学一门课考试及格。大部分课我都没时间听。我的工作日从上午 10 点开始，到晚上 6 点结束，午饭有一段短短的休息时间。下班后就开始与情报员在秘密接头点接头，从晚上 7 点半持续到 11 点。然后我回到办公室，将所获材料向上级汇报。

根据列宁 1922 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安局应该成为所有各级苏维埃领导的基本情报来源。直到今天，国家领导还要从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工渠道获得有关国内形势的月报。这类报告应详细汇报国内的困难和各组织、企业及机构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斯大林时期就定下了规矩，不得在白天与情报员

接头。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碰头会都在晚上进行。众所周知，斯大林喜欢熬夜，所以我们也按这种作息制度工作。

有趣的是，领导我处情报科工作的竟是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的旧沙俄军队里的军官科泽尔斯基。虽然此人曾在沙皇军队中服过役，但他在革命年代里表现出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使他赢得了我们的信任。1937年，他自杀死亡，以此逃避清洗运动中的逮捕。

对我来说，艾玛是一个理想中的真正的女人，我们1928年结了婚，尽管是在1951年才正式进行婚姻登记。我的许多同事都是这样，很多年都没有办结婚手续。

与此同时，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非同寻常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政治保安总局和党组织领导共同负责。我的新职务是：普里卢基流浪儿童特殊教养院政委。内战结束后，这一类教养院都把挽救那些由于饥饿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孤儿作为自己的宗旨。每个契卡工作人员都得拿出自己工资的10%用于维持这些教养院的开销。教养院建起了一些小工厂和职业培训班，孩子们的劳动在当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取得了教养人员的信任后，我顺利地创办了一个灭火器制造厂，并很快见到了效益。

我妻子在乌克兰党内所处的地位使我能够两次与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科肖尔见面。两次会见都是在哈塔耶维奇的家里，我们是作为客人被请去的。两位领导人对乌克兰前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他们认为经济问题和集体化带来的灾难都是暂时的困难，应该尽可能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克服。按照他们的说法，必须教育培养一代新人，使他们绝对忠诚于共

产主义事业,并摆脱一切旧思想的束缚。应该把发展和扶持新型的敌视民族主义思想的乌克兰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放在首位。60年后,苏联的解体清楚地表明:至少应该表现出忍耐并尽力去理解敌对的一方,而不一定非要将其消灭不可。

科肖尔和哈塔耶维奇这样的人与我们像同党内同志一样交谈,这使我和妻子都受宠若惊。当时我们还是共青团员,成为预备党员是后来的事了。

1933年,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安局领导人巴利茨基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前往莫斯科担任新职时,他带走了几个助手人员,其中也有我一个。我在国家安全机关总部的干部处担任了高级监察员,主管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际处的人员任免工作。

那时,我在工作中开始频繁地与当时的国际部主任阿尔图佐夫以及他的副手斯卢茨基打交道。1933年,负责监视西方乌克兰侨民并与之作斗争的参谋库利尼奇因为健康原因而提交了辞职报告。当了解到我是出生在乌克兰并具有在那里的工作经验后,阿尔图佐夫建议让我担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前,艾玛也调到莫斯科,在秘密政策部任职。从1934年起,她兼管起刚刚成立的作家协会以及创作知识界里的情报网工作。

1934年,苏联外交人员马依洛夫在利沃夫惨遭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恐怖分子列梅克杀害,此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缅仁斯基颁布命令,要求制定出一项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恐怖活动的行动计划。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安局报告说,他们已成功地将经过考验的谍报人员列别德打入了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一个军事组织。这是一个重大成果。

当时已是国际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建议我到国外去搞地下工作。起初,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事,因为我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

验,我对西方的生活条件也一无所知。再说,我在德国和波兰工作所必需的德语知识也等于零。

然而,我对这个建议考虑得越多,就越感到它对我有吸引力。于是我接受了这一建议,尔后我便立即投入了德语强化学习,每星期在秘密接头地点上5次课。经验丰富的教官们还向我教授了擒拿格斗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际部副主任施皮格尔格拉斯的会见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他具有丰富的国外秘密工作经验,他曾在中国和西欧工作过。30年代初,他曾在巴黎的蒙马特附近开了一间专营大鳌虾的鱼店作为掩护。

经过8个月的训练,我已作好了首次陪同列别德到国外出差的准备,列别德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驻乌克兰的总代表,而实际上,他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秘密间谍。从1915年至1918年,列别德曾与科诺瓦列茨一道在察里津附近的战俘营里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别德和科诺瓦列茨曾作为奥—匈联军军官共同在西南战线上的所谓“赛切弓弩军”里与俄罗斯作战)。内战期间,他是科诺瓦列茨的副手,指挥过一个步兵师在乌克兰与红军作战。当1920年科诺瓦列茨逃往波兰之后,列别德被他派回乌克兰组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下网。但列别德在那里被逮捕了。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是:要么为我们干,要么死路一条。

列别德在20年代乌克兰剿匪斗争中成了我们的关键人物。像从前一样,他在国外的民族主义分子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科诺瓦列茨认为自己的代表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是一个有能力筹划夺取基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权力的人。我们曾在20—30年代批准列别德通过秘密途径去西方,我们从他那里得知,科诺瓦列茨打算在未来的战争中夺取乌克兰。列别德

在柏林见过 30 年代曾任德国间谍机关领导的维尔格尔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前任亚历山德尔上校,并从其口中得知:科诺瓦列茨曾两次与希特勒会见。希特勒提出建议,让科诺瓦列茨的几名追随者到莱比锡纳粹党校参加集训。

为了协助列别德工作,我假扮成他的“侄子”和他一起出国。我妻子也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际处,以便使我通过她与总部保持联系。她的身分是来自日内瓦的一名女学生,这样她就能经常和在西欧的谍报人员会面。为此她经过了专门的训练。

列别德不知道,还有一个谍报员在为我们工作,他就是科诺瓦列茨驻芬兰的总代表波卢维杰科。他凭着假护照在赫尔辛基生活,在那里为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在列宁格勒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将自己的档案材料藏匿在列宁格勒著名的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图书馆里。我们虽然知道这一点,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49 年才发现了这批档案。

列别德把我送到赫尔辛基,托付给了波卢维杰科,就立即经由莫斯科回到了哈尔科夫。波卢维杰科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分,他一直通过与他联系的卓娅·沃斯克列先斯卡娅-雷布金娜定期向内务人员委员部报告我的情况。我应该让总部知道我一切正常,所以我按照早先约定的方法,给自己的“姑娘”写个字条,然后将它扯掉并扔进废纸篓里。波卢维杰科无意中充当了我的助手,将废纸片收了起来并交给了卓娅。波卢维杰科曾一度写报告建议要把我干掉,但幸运的是:这事不是他能作得了主的。在芬兰(后来在德国)我生活得非常清苦:我没有零花钱,还得经常忍饥挨饿。波卢维杰科一天只分给我 10 个芬兰马克,这仅仅够吃饭用的,而且还得拿出一个硬币支付晚上的煤气钱,不



然的话就停止供暖,煤气炉也不能用。在我们秘密会面时(会面时间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定好),卓娅·雷布金娜和她的丈夫鲍里斯·雷布金——驻芬兰的谍报负责人,我在这个国家从事情报工作的领导人——经常带来一些面包和巧克力。临走之前,他们都要看看我的口袋,直到确信我没带走任何食物,因为那样会断送我们的“游戏”。

等了两个月以后,科诺瓦列茨派来的联络员——一个是来自布拉格的格里比夫斯基(“首相”),一个是来自布鲁塞尔的安德里耶夫斯基——抵达了赫尔辛基。我们便乘船去了斯德哥尔摩。

上岸后,我领到了一个立陶宛假护照。船到了斯德哥尔摩,所有乘客都在餐厅集合,服务员开始分发由边防站检查过的护照。起初,他不肯把我的护照还给我,说是照片与本人明显不符。事实上,这护照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中央领导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分子斯齐博尔斯基的,照片也是他的。幸亏波卢维杰科怒气冲冲地出面干涉,他吓唬服务员,让他把证件还给了我。在斯德哥尔摩逗留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前往德国,在那里,我的护照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1936年6月,我们到了柏林,见到科诺瓦列茨时,他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我们的会面是在民族志博物馆的一所住宅里进行的,这所住宅是由德国间谍机构提供给他的。9月,我被派往莱比锡纳粹学校学了3个月。学习期间,我有机会结识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组织的领导人。学员们对我的身分自然也很感兴趣。然而我的“传奇经历”并没有使我遇到任何麻烦。

我和科诺瓦列茨之间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质内容。他的计划之一就是要为乌克兰的一些州筹建行政机关,这些州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放,而且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要同德